

“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 法国史书写*

黄艳红

摘 要：法国新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取向削弱了传统的民族史叙事，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导致民族国家意识的淡化，个别化的历史记忆、逆向的记忆和认同日益凸显，拉维斯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走向碎裂。“记忆之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皮埃尔·诺拉试图通过对记忆之场的回想，追寻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这一研究虽然受到拉维斯《法国史》的启发，但比后者更具包容性，是具有反思性的“第二层次的历史”。它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在已然“遗产化”的民族记忆中追寻身份的努力。“记忆之场”的提出，意味着法国民族史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一种深刻变革，历史的连续性动摇了，这可视为一种新的“历史性体制”——“当下主义”的标志。

关键词：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 民族主义 当下主义

最近 30 年来，国际学界围绕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展开热烈讨论，“记忆之场”概念频频出现于各种语境中。诺拉自己也曾不无骄傲地宣称，该著是继《年鉴》杂志之后法国史学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贡献。^① 的确，在这部宏大著作的启发下，其他欧洲国家也推出了类似的研究成果，^② 甚至引发了关于“欧洲的记忆场所”的讨论。^③ 我国学界对诺拉的工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国大通史》编纂”（12&ZD187）阶段性成果；作为会议论文，提交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青年史学家论坛”。拙文承蒙外审专家和与会学者指教，特致谢忱。

① Pierre Nora, “La loi de la mémoire,” *Le débat*, no. 78 (Jan. 1994), pp. 178-182.

② 在德国、荷兰和意大利，类似的多卷本著作甚至连标题都与“记忆之场”很接近：Etienne François and Hagen Shulze, eds., *Deutsche Erinnerungorte*, 3 vols., München; C. H. Beck, 2001; Henri Wesseling, ed., *Plaatsen van herinnering*, 4 vols., Amsterdam; Bert Bakker, 2005-2007; Mario Isnenghi, ed., *I luoghi della memoria*, 3 vols., Rome; Laterza, 1996。西班牙、俄罗斯、卢森堡和东欧各国近年也有类似著作问世。参见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sont-ils exportable?” in *Présent, nation,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2011, pp. 373-384.

③ Pierre Nora, “Y a-t-il des lieux de mémoire européens?” in *Présent, nation, mémoire*, pp. 385-391.

作亦有关注。^①

《记忆之场》全书共分三部：《共和国》、《民族》（三卷）和《复数的法兰西》（三卷），分别于1984年、1986年和1992年出版。全书共七卷，收入135篇论文（包括诺拉的三篇总论性文章：《记忆与历史之间》、《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和《纪念的时代》），作者达120位。1993年“记忆之场”（lieu de mémoire）正式成为罗贝尔词典的词条，成为一个广泛通行的术语，这距离诺拉首次倡导“集体记忆”研究只有25年的时间。^②这表明，《记忆之场》不仅在学界受到广泛重视，它本身探讨的问题亦具有时代意义。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本文拟考察该著问世的历史背景及其问题指向、它在历史书写路径方面的探索，以及它所反映的20世纪末法国史学界在历史意识方面的深刻转变。因《记忆之场》全书内容涉面很广，^③各位作者的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只选取一个特定的切入点，不过这个切入点可以比较好地反映诺拉本人的总体设想，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该著的众多篇章之中：这就是诺拉明确提到的新的法国史书写。

一、传统历史记忆的衰落

1984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编纂了一本《法国史入门》，旨在推动法国人重新认识法国，因为他认为“法国正在失去它的记忆”。^④这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民族国家的历史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而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民族国家的历史一直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工具，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国人的历史认知。这意味着，在20世纪60—80年代，民族国家在法国史学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拉维斯主义^⑤的历史终结了。^⑥这是历史学的学科演进与法国社会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记忆之场》开篇处的“历史记忆的终结”一说，^⑦即可视为拉维斯主义终结的另一说法。“历史记忆”是诺拉发明的概念，简言之，它是被历史学家重构的记忆或对共同的过

① 参见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学海》2015年第3期。最近《记忆之场》的中文选译本也已出版。参见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社会文化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 Philippe Joutard, “Mémoire collective,” in Christian Delacroix et al., eds., *Historiographie*, II, *Concepts et débats*, Paris: Gallimard, 2010, pp. 779-790.

③ 总目录见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社会文化史》，第523—532页。

④ Jacques Revel,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L' espace françai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0, pp. 7-8.

⑤ “拉维斯主义”一说，前引沈坚等人的文章已有使用。诺拉本人曾多次撰文论述拉维斯的《法国史》及其历史教育：Pierre Nora, “Ernest Lavissee: son rôle dans la formation du sentiment national,” *Revue historique*, vol. 228, no. 1, 1962, pp. 73-106; “Lavissee, instituteur national. Le ‘Petit Lavissee’, évangile de la Républiqu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97, pp. 239-275; “L’ ‘Histoire de France’ de Lavissee, pietas erga patriam,”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851-920。国内学者的研究见顾杭：《传统的发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对共和文化的塑造》，《史林》2010年第5期；《战争创伤、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论拉维斯与第三共和国初期的历史教育》，《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曾晓阳：《论19世纪末法国促进民族统一的教育举措》，《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⑥ Jacques Revel,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L' espace français*, p. 13.

⑦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 23.

去的回想。^① 最成功的历史记忆是“民族传奇”(roman national), 它向民族国家的公民(尤其是学生)解释过去, 以论证民族当下的合理性并展望远大前程。民族传奇需要主权国家来传播, 使其在个人记忆中打上烙印, 学校教育是最重要的传播渠道。^② 在拉维斯主义诞生的第三共和国, 历史、记忆和民族是三位一体的: 学术研究与教科书紧密结合, 后者负责把前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国民记忆。^③ 这种建立在专业历史学基础之上、关于民族过去的共同记忆, 即诺拉所称的“历史记忆”。

民族传奇的黄金时代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 从19世纪20年代梯叶里发表《法国历史通信》到1933年瑟诺博斯出版《法兰西民族信史》, 其间的米什莱和拉维斯是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民族史的巅峰。^④ 诺拉尤其强调拉维斯的典范意义, 认为他是“法国史”(Histoire-de-France)这一独特的、以统一性为特征的编年体民族史中最杰出的代表。^⑤ 拉维斯不仅主编了27卷的《法国史》, 还是第三共和国历史教育的主持人, 他的历史观念通过中小学历史教育而成为19世纪末以后几代法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拉维斯从不讳言他的《法国史》是为了培养法国人的爱国情操, 让他们认识到民族历史的伟大并热爱共和国; 以民族国家为叙事框架, 将共和国视为民族历史的必然,^⑥ 以过去来论证当下的合理性。拉维斯主义还有如下特征: (1) 构建民族历史的连续性——尽管雅各宾派处死了国王, 但这些革命者捍卫法国的执着和热情与过去的君主一脉相承; (2) 强调法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占有独特地位, 负有特别使命。有关贞德的记忆便包含对法兰西民族“天定使命”的诠释: 法兰西民族是“教会的长女”、是革命和人权的圣殿、是各民族中的“王者”和“教母”。^⑦

拉维斯主义在历史教育中的垄断地位一直延续到二战以后。^⑧ 但此时历史学科的走向与拉维斯主义分道扬镳了。战后新史学的源头, 可以追溯到1930年前后法国史学的“结构转向”, 其标志是《年鉴》杂志的创刊。从此, 历史认知的对象从民族国家、政治军事开始转向中长时段的社会生活, 经济、人口等成为史家关注的核心; 历史从对民族国家的叙说“逐渐演变成社会对自身的认识”, 并“摆脱了与民族合一的身份”。^⑨

拉维斯的《法国史》以标志性事件(首先是政权变更)为核心、按年代顺序讲述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该著的目录便反映了这种叙事线索;^⑩ 但战后的主流历史学, 重点关注的不是国家而是社会。过去的民族国家历史中, 重大事件、重要日期是进步的标签, 如“1789年”、“1848年”等。但在新史学中, 时间与进步的关系就不那么明显了。拉迪里宣扬一种“静止的历史”, 布罗代尔甚至说, 只有平庸甚至糟糕的学者才会去研究大革命和“1848年”。^⑪ 在这种视

① Philippe Joutard, *Histoire et mémoires, conflit et allianc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5, pp. 17-18.

② Philippe Joutard, *Histoire et mémoires, conflit et alliance*, p. 101.

③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 p. 27.

④ Pierre Nora, “Une autre histoire de France,” in *Présent, nation, mémoire*, pp. 153-155.

⑤ Pierre Nora, “Pourquoi lire Lavisce aujourd’hui?” in *Présent, nation, mémoire*, p. 203.

⑥ Pierre Nora, “L’ ‘Histoire de France’ de Lavisce, pietas erga patriam,” p. 890.

⑦ Michel Winock, “Jeanne d’ Arc,”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4467-4469.

⑧ Christian Delacroix et al., *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 XIXe-XX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2007, pp. 473-475.

⑨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 pp. 27-28.

⑩ Pierre Nora, “L’ ‘Histoire de France’ de Lavisce, pietas erga patriam,” p. 898.

⑪ Keith M. Baker, “In Memoriam: François Furet,”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2, no. 1, 2000, pp. 1-5.

角中，时间感知走向扁平化，再加上研究题材的不断扩展，历史叙说变得相对无序，而在拉维斯主义的历史叙述中，民族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清晰的时间脉络。^①

二战之后的数十年中，法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终结”，有人称这是“第二次大革命”，诺拉自己也使用这一说法。^②首先是战后殖民帝国的终结和法国世界大国地位的丧失。非殖民化深刻改造了民族国家的地位，“民族的神话”被撼动并失去了历史根基。在过去，法国人的历史记忆具有普世主义和弥赛亚信念，如米什莱说法兰西民族是“人类航船的舵手”；^③而且它很自然地与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在拉维斯那里，第三共和国的殖民扩张被描绘成开化落后人民。^④但是，随着非殖民化的发展和青年学生的激进化，民族神话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年轻一代不再毫无批判地接受拉维斯主义的历史观。《民族的神话》、《法国人的神话历史》等新著，^⑤都在质疑拉维斯主义民族史，认为它营造出的是共和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理想城”。^⑥

20世纪70年代，由于战后长期的经济增长、移民的大量涌入、女权主义等“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地域认同的抬头，法国的社会关系和公共领域的轮廓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⑦传统的农民阶级消失了，工人阶级变得日益多元，其战斗色彩在减弱；在学术上，传统的工人运动史也更加重视移民、妇女等社会群体。^⑧国内学界在讨论历史学的“碎片化”时，多聚焦于学科内部的发展；^⑨在法国，类似的史学现象经常被称作“*éclatement*”，意思是碎裂，但它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公共领域的新格局有直接关系，亨利·鲁索（Henry Rousso）1998年在评述记忆研究的兴起时指出：

如果说与过去的纠缠关系以记忆方式表达出来……大概还因为公共空间的重新定义。在这方面，少数群体的问题尤其明显，无论是性别的——首先是妇女作为特别类群的出现——还是宗教的、种族的、地方的或地区的……新的群体或新的实体……都以一种新方式要求在公共空间中获得一席之地，它们认为自己应有的地位被排斥了……被大写的历史（*Histoire*）排斥的群体介入公共舞台几乎总是表现为政治行动，还有……对过去的重新理解，对某种特别的历史的把握，这种历史被视为具有个别性，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如民族史。此后，人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记忆，或者说话的传统，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因为传

① Jacques Revel,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L' espace français*, pp. 14-15.

② Pierre Nora, “Comment écrire l' histoire de Franc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 2231. “第二次大革命”是社会学家 Henri Mendras 提出来的，他认为标志性的起始日期是在1965年，但诺拉认为1975更具标志意义。因为到此时，以戴高乐主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以及革命观念双双走向衰落，再有就是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这些现象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深刻地改变了法国人同过去的关系，以及民族情感的传统模式。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mode d' emploi,” in *Présent, nation, mémoire*, pp. 157-169; Henri Mendras, *La seconde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65-1984*, Paris: Gallimard, 1988.

③ Philippe Joutard, *Histoire et mémoires, conflit et alliance*, p. 109.

④ 转引自顾杭：《战争创伤、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论拉维斯与第三共和国初期的历史教育》，《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第127页。

⑤ Suzanne Citron, *Le Mythe national*, Paris: Editions ouvrières, 1987; Claude Billard and Pierre Guibert, *Histoire mythologique des français*, Paris: Galilée, 1976.

⑥ Philippe Joutard, *Histoire et mémoires, conflit et alliance*, pp. 168-172.

⑦ Emile Chabal,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1970s: Liberalism,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Modest Stat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ol. 42, no. 2, 2016, pp. 243-265.

⑧ 参见米歇尔·比日耐：《法国工会史研究的焦点与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

⑨ 如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统的历史遮盖了某些历史行动者扮演的特殊角色。^①

质言之，当妇女或其他特殊群体试图在公共舞台上表达自己时，它们会向过去寻找资源，这种过去主要是以口传记忆承载的，它有别于传统的、书面的、大写的历史——特别是民族国家视角书写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的衰落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政治的产物，这种缺乏稳定轮廓的政治，追求的是社会内部各特殊群体的叙事。^②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世纪以来，学校教育赋予法国人的集体记忆受到了挑战。^③

如诺拉于2002年提出的法国社会内部的“去殖民化”，便是公共领域新格局的突出表现。^④内部去殖民化可以从地域和群体两个方面来观察。对地方性的强调早在《记忆之场》问世前就出现了。^⑤旺代地方记忆的复苏是突出例证。大革命期间，旺代地区的叛乱引发了残酷的内战。对内战的记忆主要依靠口传和仪式，在当地的家族和村庄中流传。^⑥而且，当地人对档案馆里保存的记录很不信任，认为它只反映共和派胜利者的观点。^⑦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到来之际，上演了一场围绕旺代屠杀的记忆论战。旺代人甚至要求抹去凯旋门上那些曾参与镇压这场叛乱的将军们的名字。^⑧以历史学家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为代表的人士不仅强调内战的残酷和伤亡的惨重，更愤慨于一个世纪以来官方史学对此的沉默和遗忘。^⑨旺代记忆的强势复苏表明，拉维斯主义关于大革命塑造民族统一的神话被揭穿了。此外一些关于边缘群体的记忆渐次兴起，其中移民群体尤其有代表性。法国虽然是欧洲第一移民大国，但在法国集体记忆中移民群体却长期“缺席”，而且政府对移民的排挤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⑩1973年，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一批移民（pieds-noirs，意为“黑脚”）就组织了一个致力于保存“黑脚记忆”的组织，它声称要推翻法国官方叙述的阿尔及利亚历史，并依据个人回忆重述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⑪

这些记忆的兴起都意味着对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的质疑，直接挑战这种“大写的”历史记忆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看，这种记忆引起了一种去民族国家意识的“逆向认同”，与此相应的是法兰西认同走向衰落，这在有关大革命的纪念活动中尤其明显。近20余年里，法国

① Christian Delacroix et al., *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 XIXe-XXe siècle*, pp. 564-565.

② Emile Chabal,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1970s: Liberalism,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Modest State," p. 265.

③ Christian Delacroix et al., *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 XIXe-XXe siècle*, pp. 479-480.

④ Pierre Nora, "Pour une histoire au second degré," *Le Débat*, no. 122 (May 2002), pp. 24-31. 诺拉提出的是个总结性的概念。早在1966年，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就在法国西部的圣布里厄号召“让本省去殖民化”。类似的诉求也出现在其他地区，诺拉称之为“外省和村民们的68年五月风暴”。参见 Philippe Joutard, *Histoire et mémoires, conflit et alliance*, pp. 25-28.

⑤ 如 Françoise Zonabend, *La mémoire longue: temps et histoires au village*, Paris: PUF, 1980.

⑥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région-mémoire, Bleus et blancs,"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519-534.

⑦ Philippe Joutard, *Histoire et mémoires, conflit et alliance*, p. 89.

⑧ Philippe Joutard, *Histoire et mémoires, conflit et alliance*, p. 90.

⑨ Steven L. Kaplan, *Farewell, Revolution, The Historians' Feud, France, 1789/198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7-39. 大革命200周年前夕（1986），塞谢尔撰写了一部批判这场暴行的著作，其标题颇有意味：《法国人对法国人的种族灭绝：作为被报复者的旺代》。（Reynald Secher, *Génocide franco-français, La Vendée-vengé*, Paris: PUF, 1986）

⑩ 乐启良：《当代法国社会史的革新——热拉尔·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探析》，《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⑪ Emile Chabal,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1970s: Liberalism,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Modest State," pp. 257-263.

学界出现了两部专门研究大革命庆典活动的著作,^① 它们得出了相同结论: 1989 年的纪念活动中, 法兰西民族身份认同的衰落随处可见。^② 与过去中央集权式的操办形成对比, 1989 年的这场纪念活动主要在地方和社区层面举行, 它更多的是唤起社区的大革命记忆。在官方层面上, 纪念活动的组织者对民族主题措辞的使用十分谨慎, “民族万岁”的口号几乎只出现在一份纪念瓦尔密战役的出版物上。^③ 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观察, 纪念活动的变化反映出法国社会公共生活的深刻变革。1989 年纪念活动呈现的面貌, 意味着由大革命开创、并由第三共和国确立的全国性纪念活动的古典模式瓦解了。民族国家在纪念活动中的隐退, 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法国社会的自由化、与传统的威权制和集权制国家的削弱存在对应关系。^④

二、新民族史尝试第二层次的历史

被压抑记忆的苏醒, 代价是关于法兰西民族记忆的衰落。面对这种局面, 诺拉追问道: “如果没有集权的雅各宾主义……共和国还会剩下些什么? 如果没有民族主义……没有普世主义, 民族还会剩下些什么?”^⑤ 拉维斯《法国史》曾经塑造的国家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和带有世界使命色彩的民族意识, 已经凋零殆尽了。在这种局面下, 如果谈论法国史还有意义的话, 该以何种方式去谈论?

诺拉的《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 明确表达了他重新书写法兰西民族历史的意向。不过, 诺拉自己也承认, 在他提出“记忆之场”的创意时, 民族史已经有复苏的势头,^⑥ 如布罗代尔的《法兰西的特性》(1986) 以及乔治·杜比和弗朗索瓦·孚雷等人撰写的五卷本《法国史》(1987—1991)。《记忆之场》之所以更具影响力, 是因为它在民族史的框架内, 通过盘点民族历史的“记忆之场”来回应正在解构民族史的记忆研究, 因而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古贝尔说“法国正在失去它的记忆”, 《记忆之场》的序言一开头就指出, “之所以有记忆之场, 是因为已经不存在记忆的环境”, “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 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⑦

《记忆之场》的序言并没有对“记忆”作明确的定义。关于这一概念在法国史学界的讨论和发展, 已有专门分析, 这里不再赘述。^⑧ 不过诺拉曾提到“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巨大鸿沟”, 此处的记忆意指原始的、古代社会的记忆, 带有较强的私密性。这一说法与记忆研究的另一名著《犹太历史与犹太记忆》对历史与记忆的区别类似。^⑨ 但《记忆之场》中大量论述的是以文字形式、尤其是历史撰述承载的“历史记忆”, 这种记忆同样具有神圣性。如拉维斯的《法国史》就

① Pascal Ory, *Une nation pour mémoire, 1889, 1939, 1989, trois jubilés révolutionnaires*,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92; Patrick Garcia, *Le Bi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ratiques sociales d'une commémoration*, Paris: CNRS Edition, 2000.

② Pascal Ory, *Une nation pour mémoire, 1889, 1939, 1989, trois jubilés révolutionnaires*, p. 253.

③ Patrick Garcia, *Le Bi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ratiques sociales d'une commémoration*, pp. 299-308.

④ Emile Chabal,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1970s: Liberalism,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Modest State,” pp. 252-257.

⑤ Pierre Nora,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p. 2235.

⑥ Pierre Nora, “Une autre histoire de France,” p. 151.

⑦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 p. 23.

⑧ 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 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3 期, 第 209—214 页。

⑨ Yosef H. Yerushalmi, *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是以历史面目呈现出来的神圣记忆，“历史是神圣的，因为民族是神圣的。正是由于民族，我们的记忆才能立足于神圣的殿堂中。”但二战以来的历史研究和社会演变使得这种历史记忆褪去了神圣色彩。基于这种情形，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既以某种方式光大拉维斯的民族史传统，又在“颠覆”这种已成为过去的法国史。^①

《记忆之场》的批评者认为，这套著作一方面试图为法兰西举行葬礼，另一方面又暗中鼓吹“拉维斯式的”（à la Lavissee）民族主义。^②在他们看来，《记忆之场》最初是为了“解构民族历史，以及它的表象、它的神话”，但其最初反拉维斯主义的意愿最后成了“歌颂法兰西的光辉认同的新拉维斯丰碑”。^③从诺拉的意图来看，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他早年就已经尝试这种民族史，而且从不讳言自己深受拉维斯的影响，“没有他（拉维斯——引者注），《记忆之场》就无法设想”，该著是在民族史的框架内设问，甚至其宏观设计思路也受拉维斯的启发：共和国、民族和“多元但统一的法兰西”（Les France）依稀让人想到当年拉维斯的努力，^④因为拉维斯的27卷《法国史》正是将民族、共和国和法兰西融汇在一起。^⑤

但诺拉不承认《记忆之场》是在复活拉维斯式的民族主义。新的民族史不可能按拉维斯的方式去书写，“民族主义不可能从民族的葬礼中获得能量”。^⑥国内外的去殖民化运动已经摧毁了旧式的民族主义历史，民族国家和历史不再合一。^⑦在这一切成为过往后，民族历史应该谋求新的出路，这就是诺拉曾尝试过的路径：以一种“民族情感”的研究来取代过去的拉维斯主义，它着重分析凝结着集体记忆的各个场所（lieux），这些场所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法国的象征。^⑧但这种记忆并非拉维斯《法国史》宣扬的“侵略性的”“强烈索要的记忆”，^⑨诺拉在《记忆之场》中试图呈现的，是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民族主义历史教育之后，今天的法国已经与高卢中心主义、帝国主义和普世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脱钩了，现在该是法兰西“与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相逢”的时刻了。^⑩

这些说法是在民族主义衰落的背景下提出的。无论是左翼雅各宾式的爱国主义，还是保守的右翼版本的爱国主义，都在20世纪后期成了绝唱。^⑪大革命200周年的纪念活动、共产主义和戴高乐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衰落，^⑫都清楚地见证了这一点。因此，在这种情形和心态下书写“民族”，势必与拉维斯代表的那种民族意识有所区别，它不是对第三共和国民族史学的简单复归。

关于《记忆之场》的创新之处，国内学界已有所论及。可以补充的是，从选题来看，该著没有回避民族历史上的冲突和分裂。虽然《记忆之场》像拉维斯《法国史》一样，有某种担当

①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mode d’emploi,” p. 161.

② Pierre Nora, “La nation sans nationalisme,” *Espace Temps*, 59-60-61/1995, pp. 66-69.

③ Christian Delacroix et al., *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 XIXe-XXe siècle*, p. 553.

④ Pierre Nora, “Pourquoi lire Lavissee aujourd’hui?” pp. 193-204.

⑤ Pierre Nora, “L’ ‘Histoire de France’ de Lavissee, pietas erga patriam.”

⑥ Pierre Nora, “La nation sans nationalisme,” p. 67.

⑦ 参见 Pierre Nora, “Pourquoi lire Lavissee aujourd’hui?” p. 203.

⑧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mode d’emploi,” p. 157.

⑨ 这是诺拉自己对拉维斯主义的评论。参见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⑩ Pierre Nora, “La nation-mémoir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2211-2215.

⑪ Pierre Nora,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pp. 2233-2234.

⑫ Pierre Nora, “Gaullistes et communistes,”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2489-2532.

民族“教化传奇”的抱负,^①但它并不追求后者那种“全景式的(panoramique)统一”,^②而是充分观照到民族史碎裂后的成果和现实:如“多元但统一的法兰西”一卷中有一组文章的主题是“冲突和分裂”(conflits et partages)，“共和国”一卷也收入了两篇主题为“反记忆”的文章:《旺代》和《巴黎公社墙》。因此《记忆之场》在内容上更富包容性,它承认过去的历史记忆掩盖的冲突也是民族历史的一部分。米歇尔·维诺克对贞德记忆的评论可以诠释这一点。曾经被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思潮利用的洛林姑娘贞德,某种意义上凝结着法兰西历史中既相互对立又彼此依存的观念和传统,她是“统一”的,也是分裂的(une et divisible)。^③贞德形象同样可以诠释第三卷那个单复数混用的标题:les France (“多元但统一的法兰西”)。

从形式上看,《记忆之场》已经不再是一部统一的、编年体的法国史,而是对民族记忆各个凝结点——即“场所”的盘点与回溯。在《民族》卷的导言中,诺拉强调应从象征的维度研究民族的“表征”(représentation),即使是实体性的疆域问题——如“六边形”,也多着眼于历史上的文本、话语和观念意象的分析。至于史学撰述(如中世纪的《法国大纪年》)、景观(如白朗士的《法国地理概论》)等课题,则更是“第二层次的事实”了,因为它们或是构建、或是反映、或是“内化”于当下的过去。^④

《记忆之场》不但考察“第二层次的事实”,诺拉还认为应采取与过去不一样的研究路径,即考察“第二层次的历史”。这种历史关注法国的各种民族表征,但它较少关注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对它们在时间中的构建、消失和其意义的重现感兴趣;较少对实际发生的过去感兴趣,而是对过去的不断的被利用、再利用和滥用,以及过去对于连续不断的当下的全部意义感兴趣;较少对传统感兴趣,而是对构建和传递传统的方式感兴趣”。易言之,第二层次的历史关心的是“过去在当下的整体功能及被操控的方式”。^⑤

第二层次的历史意味着,研究者关注的重心、问题导向乃至使用的材料,都与以再现历史事件本身的真相为使命的传统史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它的出发点在于,通过记忆传承到当下的历史事件,其形态和意蕴是有变化的,而何以发生这些变化则是研究者应关注的中心问题。对第二层次的历史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人们如何去再现它。例如,维诺克对贞德故事本身(即“实际发生的过去”)着墨极少,作者关注的重点是贞德身后的故事。法国人对贞德的记忆只是到19世纪才活跃起来。但在整个19世纪,关于贞德的记忆是撕裂的,她既是天主教的圣徒,也是出身平民的爱国英雄,甚至是“高级种族”的纯洁之花;天主教会、共和派和反犹主义者,都在利用或滥用与贞德有关的各种历史细节,对贞德记忆的争夺战鲜明地反映了当时法国的政治纷争。与其说维诺克是在讲述贞德,不如说是透过贞德讲述近现代法国的政治生活,并通过这段纷扰变幻的故事来回想“法兰西天性”,认识这个“既统一又分裂”的民族。^⑥从这个意义上说,维诺克感兴趣的不是对贞德的回忆或记忆本身,而是后代人(或曰“连续不断的当下”)对有关贞德的记忆进行操控的方式和目的。

① François Hartog, “Temps et histoire: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50^e année, no. 6 (Nov. -Dec. 1995), p. 1233.

② Pierre Nora, “L’ ‘Histoire de France’ de Lavis, pietas erga patriam,” p. 879.

③ Michel Winock, “Jeanne d’ Arc,” pp. 4469-4470.

④ Pierre Nora, “Présentation,”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571-581.

⑤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mode d’ emploi,” p. 169.

⑥ Michel Winock, “Jeanne d’ Arc,” pp. 4427-4473.

《记忆之场》有一组论文讨论历史上法国的领土空间和边界。^①今天的法国人都了解自己的国家是“六边形”，19世纪的法国读者都知道，莱茵河是他们历史悠久的“自然疆界”。但“六边形”直到20世纪60年代殖民帝国解体后才真正进入法国人的日常用语，而且，直到19世纪末，普通法国人对于法国的地理轮廓缺少视觉印象，因为当时很少使用教学地图。“六边形”是很晚才构建起来的传统，也是法兰西民族重新自我定位的一个反映。至于自然疆界，它的实际内容和政治指向都是变化的，莱茵河作为自然疆界进入法国人的历史记忆，很大程度上是复活“高卢”这一历史意象的结果。在中世纪，国家边界并不比其他类型的边界更为重要，对边界记忆的强调是近代主权国家崛起的一个结果，但其中经历了“四河之境”记忆的消失以及古代高卢记忆的重现等复杂过程。从这些例子来看，第二层次的历史是莫里斯·哈布瓦赫关于记忆的经典论述的具体阐发：记忆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当下”的条件而重构过去，它总是处于变化之中。^②记忆的功能并非为了完整地保存过去。

对象征符号的记忆及其政治利用，鲜明地反映在三色旗、马赛曲、七月十四日国庆日、“自由—平等—博爱”格言等记忆之场中。^③这些象征符号都渊源于大革命，但它们最终确立为共和国的象征，都经历了一段相当曲折的过程，历时约一个世纪之久，而它们的共和主义象征意蕴毋宁是在这段历程中逐渐被塑造和突出的。例如，三色旗最初的象征意义、旗帜的具体形象和三种颜色的排列顺序，都是不确定的。它真正深入人心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对外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尤其是它成为白旗的对立面时；但白旗作为王党和旧制度的象征，也是在大革命战争年代被构建出来的。当1830年的七月革命推翻波旁复辟王朝，年迈的拉法耶特将军将三色旗授予新国王路易·菲利普时，“民族找回了自己的色彩”，人们仿佛回到了41年前（即1789年），看到了风华正茂的拉法耶特和他的三色旗带来的民族再生的希望。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时，三色旗还被赋予抵御红旗所象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第三共和国最终选定它作为国旗，不仅因为它已经是深入人心的民族象征，还因为它可以作为抵挡来自左右两翼威胁的符号。^④三色旗的百年历程典型地反映了象征物在时间中的意义的消失、重现和重构，以及各种政治格局下人们对它的利用。阿尔托格指出，记忆之场中的“场”是对西塞罗的“locus”（地点）概念的一个修辞性用法，这个词本指供人与物放置其形象的地方，它始终是人为的；同样，诺拉的“场”也不是简单的“地点”，而是被建构和不断重构的。^⑤

第二层次的历史强调的是当下对过去的操控和利用，关注记忆、纪念所唤起的过去在当下的意义，过去本身反而是个次要的问题。这的确是历史认知兴趣的一个重大转移。按阿尔托格的观点，19世纪的“科学历史学”以过去和当下截然两分为前提，历史应始于记忆中断之处，

① Cf. Bernard Guenée,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1103-1124; Daniel Nordman, “Des limites d’Etat aux frontières nationales,”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1125-1146; Jean-Marie Mayeur, “Une mémoire-frontière: L’Alsac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1147-1169; Eugen Weber, “L’Hexagon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1171-1190.

② Maurice Halbwachs, *La mémoire collective*, 2^e édition, Paris: PUF, 1968, pp. 57, 73.

③ Christian Amalvi, “Le 14-Juillet: Du Dies irae à Jour de fêt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383-423; Michel Vovelle, “La Marseillaise: la guerre ou la paix,”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107-152; Mona Ozouf,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4353-4388.

④ Raoul Girardet, “Les Trois Couleurs,”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49-66.

⑤ François Hartog, “Temps et histoire: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p. 1231.

即始于档案文献。^① 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历史学踵武修昔底德对记忆的贬斥,^② 另一方面也因为其科学主义抱负:通过档案可以重建真实发生的过去。记忆研究导致的兴趣转移也使得史学研究的资料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不大可能通过深藏在档案馆里的文件来影响当下,其发挥影响的主要途径是对它的各种再现,影响力度取决于再现的传播域。因此《记忆之场》的很多研究都注重普通人所能接触的流行文本和图像,认为即使是对过去的扭曲和幻觉,也都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从这个层面来说,对过去的再现、利用和扭曲,同样是历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幻觉和想象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并塑造着历史。^③

因此,如果说《记忆之场》很大程度上复活了一度被忽视的事件史和政治史,但它关心的并不是事件与政治,而是媒介对事件与政治的传播和转达。^④ 这是一次重大的史学兴趣转向。诺拉曾多次提到,19世纪末法国史学曾有过一次“方法论的”(méthodique)或“史料批判”转向,《年鉴》的创生标志着“结构转向”,二战后心态史等新史学的出现则可以“人种志”转向名之,福柯的《疯癫史》是标志之一,而以《记忆之场》为代表的史学是一种“史学史”(historiographique)转向。^⑤ 他强调,这种史学史不是对史家、流派的分析,而是在民族历史的框架中,以理性的批判眼光对法国人接受的全部传统进行分析,因此这是一种相当广义的史学史。^⑥

具体言之,史学史转向要求对不同时代的各种史学撰述和记忆呈现作更为全面的剖析。如贞德、法国的疆界、共和国的各种象征符号不断被有意识的再现和利用,可以视为史学史转向的一种反映。只不过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材料不仅限于纯粹的历史著述,而是留存在民族记忆中的各种传统。但《记忆之场》中的许多论文,直接针对一类特殊的记忆之场,即法国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和历史记忆机构,这可以说是一种更为深彻的史学史,也是对拉维斯主义更为深刻的反思乃至颠覆。

反思首先针对的是19世纪民族史的科学基础——档案。在拉维斯的《法国史》中,实证主义者大有将历史化约为档案的倾向,而且他们从不怀疑档案的“普遍真理性”和“民族的特殊真理性”可以完美融合。^⑦ 《记忆之场》中有数篇论文论及作为民族的记忆之场的档案制度,以及档案与历史书写的关系。^⑧ 法国官方档案制度的设立是在12世纪末腓力二世时期,它的初衷是服务于王权的,是一种王朝记忆策略。^⑨ K.波米扬在总结八个世纪的法国档案历史时也说,档案先是与君主制的记忆、后与民族的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⑩

在法国,历史学与档案的自觉结合是19世纪初的事情。当时欧洲学界对档案的系统利用,

① François Hartog, *Régimes d' historicité: 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12, p. 166.

② Philippe Joutard, “Mémoire collective,” p. 779.

③ Daniel Nordman, “Des limites d’ Etats aux frontières nationales,” p. 1129.

④ Christian Delacroix et al., *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 XIXe-XXe siècle*, p. 526.

⑤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mode d’ emploi,” pp. 165-168.

⑥ Pierre Nora, “Une autre histoire de France,” pp. 155-156.

⑦ Pierre Nora, “L’ ‘Histoire de France’ de Lavissee, pietas erga patriam,” pp. 863, 870.

⑧ Laurent Theis, “Guizot et les institutions de mémoir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1575-1597; Krzysztof Pomian, “Les archives, du Trésor des chartes au Caran,”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3999-4067.

⑨ Jacques Le Goff,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La longue durée de l’ Etat*, Paris: Edition du Seuil, 2000, pp. 52-53.

⑩ Krzysztof Pomian, “Les archives, du Trésor des chartes au Caran,” p. 4056.

主要是为了服务于本质上属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学，后者“将档案提升至真理之保障、科学性之标准的地位”，^①从而赋予民族史书写以权威性和神圣性。但档案从其源头上说是国家权力集中的结果和反映，“权力的档案预先就规划出某种权力的历史，一种政治、军事、行政、外交和传记的历史，”一种有关领导阶级和民族国家发展的回溯性的记录。^②而且，这种形态的历史学还到处传播，它的精神和方法论被视为具有普世性，“但其实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历史的女儿：这就是古旧的民族国家历史”。^③

在德国，史学家们也注意到类似的问题。鲁道夫·菲尔豪斯在论及19世纪德国史学中的国家主义视角时说，“研究者的注意力过分地集中于政府行为和中央行政制度，当时大量国家档案材料的发掘推动了这一研究趋向；学者们完全从国家的角度、从国家行为这一渠道来考察历史”。^④于尔根·科卡指出，在19世纪，历史学家们最重要的工作场所——档案馆，“绝大多数是由国家——越来越多地由民族国家——组织建设的。”^⑤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历史学的学科基础决定了它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

这些评论都在提醒我们，兴起于19世纪欧洲的“科学历史学”的局限性，而史学史转向有助于深化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反思。权力的档案预示着权力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句鲜明的解构主义口号。在诺拉看来，以文献档案为民族服务的史学家，本质上与昔日为贵族服务的封建法学家并无二致。^⑥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前提，当《记忆之场》对民族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撰述和记忆机构进行史学史考察时，就意味着从学科内部对它们进行了一次“去神圣化”作业。这完全可以说是拉维斯《法国史》的颠覆。

不过，批判性考察的目的，同样也在于把握民族历史记忆中的重要元素和重要阶段。《记忆之场》有一系列专门探讨拉维斯之前的法兰西历史记忆的论文，^⑦即使对于被广泛认为不关注政治史的年鉴学派，波米扬也试图从马克·布洛赫的名著中指出有关民族的主题。^⑧总体而言，这些文章的设问重心都在于“历史是如何表述民族的”。当然，民族历史这个

① Pierre Nora, “L’ ‘Histoire de France’ de Lavissee, pietas erga patriam,” pp. 872-873.

② Pierre Nora, “Archives et construction d’ une histoire nationale: les cas français,” in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no. 555, (*Les Arabes par leurs archives XVI-XXE siècle*), Paris: CNRS, 1976, pp. 323-332.

③ Pierre Nora, “Archives et construction d’ une histoire nationale: les cas français,” p. 332.

④ Rudolf Vierhaus, “Absolutismus,” in *Deutschland im 18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7, pp. 63-83.

⑤ 于尔根·科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⑥ Pierre Nora, “Archives et construction d’ une histoire nationale: les cas français,” p. 332.

⑦ 如 Bernard Guenée, “Chancelleries et monastères: La mémoire de la France au Moyen Ag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587-606; Bernard Guenée, “Les ‘Grands Chroniques de France’: Le Roman aux roys, 1274-1518,”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739-758; Corrado Vivanti, “‘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 d’ Etienne Pasquier: L’ invention des Gaulois,”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559-786; Marcel Gauchet, “Les ‘Lettres sur l’ histoire de France’ d’ Augustin Thierry,”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787-850.

⑧ Krzysztof Pomian, “L’ heure des ‘Annales’: La Terre-les homes-le mond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903-952. 波米扬认为，马克·布洛赫在《会魔法的国王》(*Les rois thaumaturges*)中描绘的国王神圣权力的历史，也是一部有关君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在中世纪存在各种身份差异的社会里，国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他从性质上不同于其他的群体，但他能够、也唯有他能够维系整体，法兰西民族是国王的全体臣民，他们都从国王的世俗和超自然的权威头衔中受益，尽管他们在其

概念本身也有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在中世纪，它与王朝记忆是合一的，贝尔纳·葛奈关于中世纪的论文就揭示了这种情况。从加洛林时代到百年战争期间，制造王朝记忆、为国王服务的历史撰述中心发生了好几次空间位移：从最初的王室礼拜堂到兰斯，再到卢瓦尔河畔的弗勒里修道院，当中心于12世纪转到圣丹尼后，法国的记忆找到了一个长久的生产地和储存地。^①

应该指出的是，《记忆之场》并非这种第二层次的历史和史学史方法的首创者。在这方面，乔治·杜比的《布汶的星期天》^②堪称先驱。这部发表于1973年的作品至少反映了两种新趋向：事件史的回归和对事件记忆历程的追溯。^③杜比在书中考察了布汶战役（1214）的记忆历程：它在13世纪后一度被人遗忘，17世纪时在对卡佩王朝的颂扬声中复活，而在1914年左右达到顶峰，当时这场战役的意义比贞德还重要——贞德是抗英英雄，但英法两国已经于1904年缔结协约——因为“这是我们对德国人的首次胜利”。显然，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是理解这一记忆现象的关键。诺拉也曾谈到杜比研究的意义，并认为它是《记忆之场》的先声。^④

第二层次的历史和“史学史”可以视为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从对史料或史学的批判反思中，探究政治是如何建构或利用过去的。在今天的法国学界，第二层次的历史已经与政治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如在中世纪史研究中，学者们频频从中世纪的史学著述出发，分析当时的政治策略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如爱因哈德《查理大帝传》建构墨洛温懒王形象，目的是为了论证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的合理性。^⑤因此，考察对于过去的再现和利用是窥视当下政治的一条可行路径。

从上述分析来看，第二层次的历史有一个前提假设：包括历史书写在内的各种对过去的再现，都暗含一种有意识的权力策略，是对过去的一种政治利用，即使标榜科学的实证主义民族史也不例外。这就很自然地导致过去形象的复杂化，因为不同的历史书写、不同的时代会展现不同的过去。一旦《记忆之场》把这些不同的过去同时展现出来时，过去的整体性、连续性便发生动摇。这是该著与拉维斯主义民族史的另一个根本性差异。

三、作为“遗产”的民族与当下主义

在今天的法国学界，《记忆之场》不止是一个新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它自身的理论反思——

他方面各不相同，但在这方面他们是一致的。而在漫长的法律身份平等化历程完成之时、在信仰体系解体之后，法兰西民族已经可以构建自身的团结和稳定。他们生来就是法国人，因为一生下来就跟这个身份联系在一起，既因为共同的语言和确定的传统，也因为国家承担了防卫和维持秩序的角色；此时国王退居次席了，国王之所以为国王，是因为法国人的同意，他是法国的代表和人格化象征。总之，一开始民族是靠国王而存在，在大革命前夕，是国王依靠民族而存在。这时神奇的治病能力不再是必须的了，国王的神话死了，君主制的信仰也随之衰亡（前引文第892—933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会魔法的国王》中有关民族叙述的“时间性”（temporality）与拉维斯的《法国史》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相当长时段、缺乏明确年代标记的、隐性的民族发展史，这跟后者以政体变迁为中心、有标志性日期、集中于政治军事等事件的民族史差异较大。

① Bernard Guenée, “Chancelleries et monastères: La mémoire de la France au Moyen Age.”

② Georges Duby, *Le dimanche de Bouvines*, Paris: Gallimard, 1973.

③ Philippe Joutard, *Histoire et mémoires, conflit et alliance*, p. 171.

④ Pierre Nora, “Duby, l’ autre bataille de Bouvines,” in *Présent, nation, mémoire*, pp. 205-220.

⑤ Philippe Contamine,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politique*, I, *Le Moyen Ag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2, p. 94.

尤其体现在诺拉的一篇总论性文章中——还促使理论家们对20世纪末的法国史学乃至西方史学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这方面，弗朗索瓦·阿尔托格最具代表性。在他提出的“历史性的体制”（régime d' historicité）和“当下主义”（présentisme）概念中，诺拉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参考。

历史性体制和当下主义都是晚近的概念，前者最初是阿尔托格于1983年提出的，后来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并与当下主义放在一起进行系统的探讨。二者都牵涉历史研究中的时间经验和时间意识问题。根据阿尔托格的阐述，历史性体制指的是各个社会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确立的关系。至少可以指出三种体制。在传统的旧体制中，过去提供典范供未来模仿，历史是人生的导师。但法国大革命颠倒了这种关系，并确立了历史性的现代体制，人们开始从未来出发赋予过去意义，这种未来是历史中尚未经历过的全新未来，而时间则成为指向进步的媒介和矢量，从此历史有了一个方向，一个可以通过过去的某些特征窥视的终极目标，即德国历史学家科泽勒克所称的新的“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① 过去和当下都只是通往美好未来的过渡。在这种历史性体制中，历史是一场有目标的、连续性的运动。但在第三种体制，即当下主义中，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过去同当下也难以建立意义上的连续性，不断变幻的“当下”主宰了人们的时间意识。而法国民族历史中的当下主义，是以民族情感失去政治热度、民族转变为“遗产”为背景的。^②

阿尔托格将1789年和1989年作为未来主义（或现代历史性体制）的开始和终结的标志性日期。如果取二者的中间日期，即1889年，我们会看到“法兰西身份认同的顶点”。^③ 那一年的5月5日（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的日子），共和国总统萨迪·卡尔诺（大革命的“胜利组织者”拉扎尔·卡尔诺的孙子）在演讲中强调，大革命中的革命者是共和国的“建筑师”；次日，卡尔诺在为世界博览会揭幕时说：“法国昨天纪念开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光辉日子，今天我们来注视这个伟大的劳动和进步的世纪所创造的光辉”。人们称5月5日是“父亲们的节日”，5月6日是“儿子们的节日”。^④ 那年落成的埃菲尔铁塔，意在彰显共和国的光荣和“进步世纪”。^⑤ 这种纪念行为，明显是要将当下与过去连接在一起并展望未来：当下是共和国，未来是无限的进步，过去的大革命是它们的源头和基础。

然而，记忆和纪念活动中这种鲜明的政治取向，看来已经在20世纪末消失了，国庆仪式“已经成了每年的例行公事，而且沉浸在旅游氛围中，这样的节日看来早已失去一切党派性和战斗色彩”。法国人对国庆日已经无所用心了。^⑥ 米歇尔·伏维尔则感叹：“今天的《马赛曲》还剩下什么？”由于大革命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不断下降，《马赛曲》失去了最基本的背景参照。^⑦ 弗

① 在阿尔托格的理论建构中，科泽勒克的学说同样是重要的参照。可参见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9.

② 阿尔托格关于历史性体制和当下主义的系统论述，参见 François Hartog, *Régimes d' historicité : 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另见弗朗索瓦·阿尔托格《一个古老名词的未来：兼论当下主义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及拙作《欧洲历史中的过去和未来：简析科泽勒克和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Pascal Ory, *Une nation pour mémoire, 1889, 1939, 1989, trois jubilés révolutionnaires*, p. 253.

④ Patrick Garcia, *Le Bi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ratiques sociales d' une commémoration*, pp. 62-63.

⑤ Pascal Ory, *Une nation pour mémoire, 1889, 1939, 1989, trois jubilés révolutionnaires*, pp. 108-109; Henri Loyrette, “La tour Eiffel,” in Pierre Nora, dir., *Lieux de mémoire*, pp. 4271-4293.

⑥ Christian Amalvi, “Le 14-Juillet: Du Dies irae à Jour de fête,” p. 418.

⑦ Michel Vovelle, “La Marseillaise: la guerre ou la paix,” p. 149.

朗索瓦·孚雷也说，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个曾经引起无数争议、激发过众多史学著述的概念，现在已经“在法国人的漠不关心和繁荣昌盛中死去”。^①

记忆和纪念活动的“去政治化”现象同样体现在埃菲尔铁塔和环法自行车赛上。这两个记忆之场最初的诞生都带有国家意志。埃菲尔铁塔是“共和之塔”、“世俗之塔”，环法自行车赛是一种“国家仪式”，它试图让人铭记被德国占领的国土。然而，到《记忆之场》的年代，埃菲尔铁塔究竟象征什么“其实都无关紧要”；而环法自行车赛在二战后变成了消费盛事，完成了“从意志主义教育到消费主义教育的转化”。^②

因此，在当下这些记忆之场当初的政治意蕴都被稀释、抽离了。国庆日、马赛曲、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些记忆之场，都与大革命这一共和主义民族认同的奠基性事件相关，自然具有特殊性。但《记忆之场》中的另一些篇章同样折射出这种意识。如“自然疆界”等曾经非常具有民族色彩的话题，也已经很难体察到拉维斯主义的那种进攻性和“索要”特征了。人们可以从容地追溯“自然疆界”的观念是如何被发明出来、并服务于王朝国家边境扩张的；^③可以承认1871年德国兼并阿尔萨斯后，当地居民的情感是复杂的，并非法兰西—德意志这样简单的二元选择可以描述。^④在《六边形》一文中，尤金·韦伯在谈到二战后法国人的边界意识时说，人们的观念已经变了，过去的法国人曾十分关注边界问题，但今天这个话题已经冷却。国家边界曾经具有的重大意义为时甚短，民族国家正在融入一个更大的实体——欧盟。在这个更大的实体内，边界变得几乎和路标一样了。^⑤这种边界意识，显然与战后的欧洲建设和法德和解有关，虽然不是全部的原因。在新的局面下，民族国家在其边境内的主权不再像拉维斯时代那样绝对了。而在国内，地方认同意识的复兴同样冲淡了民族国家的绝对地位。从国内外两方面看，民族国家的意义都被弱化了，“民族情感从肯定变成了质疑”，这是传统民族主义的终结。^⑥

以上所有例证归结为一点，就是诺拉所说的，过去作为民族象征的符号完成了“从民族性到遗产性”的过渡。^⑦从国庆日到边界，过去凝聚着拉维斯主义的民族情感的符号，都已冷却为一堆灰烬，一份难以体味到昔日战斗意蕴的“遗产”。这一点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渐明朗化的，因为对“遗产”（patrimoine）的强调是随着《记忆之场》一书的进展而出现的。当全书第二卷《民族》尚未完成时，诺拉认为“遗产”一词可以统帅整部著作。正如保罗·利科所言，诺拉关于记忆之场的理解有一个内在的发展过程，这尤其体现在“记忆—遗产”（mémoire-patrimoine）上。^⑧这个概念是在《民族》卷结束之后提出的。^⑨虽然这些记忆之场见证着民族国家的过去，但诺拉此刻强调的是，记忆本身包含的各种元素已成为“集体遗产”了，“从民族性到遗产性”则是他在全书最后评论中的说法。

要理解记忆之场的“遗产”性质，仍须以“终结的时代”为背景条件，而且，在《记忆之场》问世的时代，这种“终结感”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89年

① François Furet, “L’ 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in Pierre Nora, dir., *Lieux de mémoire*, p. 2324.

② Henri Loyrette, “La tour Eiffel”; Georges Vigarello, “ Le tour de Franc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3801-3833.

③ Daniel Nordman, “ Des limites d’ Etats aux frontières nationales,” pp. 1125-1146.

④ Jean-Marie Mayeur, “ Une mémoire-frontière; L’ Alsace,” pp. 1147-1169.

⑤ Eugen Weber, “ L’ Hexagone,” p. 1186.

⑥ Pierre Nora, “Comment écrire l’ histoire de France ?” p. 2234.

⑦ Pierre Nora, “L’ ère de la commémoration,” in Pierre Nora, dir., *Lieux de mémoire*, pp. 4699-4710.

⑧ Paul Ricoeur, *La mémoire, l’ histoire, l’ oubli*, Paris: Seuil, 2000, pp. 522-535.

⑨ Pierre Nora, “La nation-mémoire,” pp. 2207-2216.

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的纪念活动。

在 1989 年之前,莫娜·奥祖夫就已经提到传统政治格局的终结。^① 推动大革命纪念活动、强化或激活其记忆的有两大逻辑:共和主义逻辑和革命逻辑。1889 年的共和国仍受君主主义和教权主义的挑战,它需要在对大革命的追忆中强化自己的合法性;1939 年,法国共产党是纪念活动的重要推手,那时候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深信,“革命永不停止,它永远具有现实性。我们的祖先看到了开端,我们还没有走完一半的路程”,“工人阶级还没有完成 1789 年的事业”。^② 在这两种情形下,当下尚未完成的事业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大革命的延续。

但是,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两个逻辑的内在动力都已枯竭。连极右翼的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也不否认“自己身处共和国之中,对这一现实并不质疑”。^③ 而革命的逻辑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也已褪去了昔日光芒,这既反映在学术研究方面——孚雷著名的檄文《法国大革命结束了》(1978)就是明证,^④ 也反映为左翼意识形态在知识界和整个法国社会的衰落。过去曾不断激活人们记忆的重大政治斗争以及革命理想主义,已经淡出了法国的公共生活。知识界也陷入沉寂。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的知识分子“失却了本世纪早期与中期的激情”,过去曾经引起极大反响的大辩论“显然已经成为历史”。^⑤

无论是民族还是共和国,都已不需要拉维斯主义那带有进攻色彩和构建主义意识的历史叙事来强化其认同,往日的冲突已消失或淡化,所有相关的元素都成为共同的“集体遗产”。这时的民族不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个给定的条件;^⑥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不仅是一种意向,而且是一种既成事实。

当民族的记忆业已成为遗产时,《记忆之场》中的某些晦涩文字便可以理解了:“历史记忆的对象逐步转向最终的死亡……人们已经摆脱了传统的余温……过去周而复始的事情已经走到了终点”。^⑦ 过去赋予国庆日的意义已经丧失,当代的人们把它转变成一场消费主义的盛宴,过去与当下已经割裂,靠传统的余温维系的历史连续性已经十分淡薄,在这种情形下,新的民族史书写必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19 世纪的法国民族史有这样一种信念:民族现状的形成和它未来的目标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过去、现在和未来存在连续性:历史是一个进程,一种进步,一种必然的发展。这就是阿尔托格说的“未来主义”的历史性体制。诺拉也意识到这种未来主义,稍有不同的是,他把回到想象中的美好过去也看作一种未来的视角。他认为,过去的民族史通常是以未来的视角书写的,这种书写的出发点是基于某种公开或隐蔽的未来期待。对未来的期待大致有三种类型:美好过去的复归,永恒的进步,通往更美好社会的伟大革命。这三种未来是统摄一切过往的终点:民族的历史或者回到理想的过去,或者通往无限的进步,或者必将迎来一场革命,而当下不会是终点,它只是通往未来的一个过渡阶段,而过去也因为这一期待中的目标而有了意义。^⑧

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有一种自觉的未来主义意识。1876 年《历史评论》创刊时,加布

① Mona Ozouf, “Peut-on commémor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e Débat*, no. 26 (Apr. 1983), pp. 161-175.

② Mona Ozouf, “Peut-on commémor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 168.

③ Patrick Garcia, *Le Bi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ratiques sociales d’une commémoration*, p. 81.

④ 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118页。

⑤ 吕一民、朱晓罕:《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1页。

⑥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 p. 28.

⑦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 p. 23.

⑧ Pierre Nora,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pp. 2231-2232.

列尔·摩诺在发刊词中称，历史研究的唯一目标就是“获得真理”，从而“以隐秘而可靠的方式致力于弘扬祖国的伟大和促进人类的进步”。^① 1922年，当拉维斯《法国史》最后一卷问世时，这位年迈的教父虽然意识到大战造成的创伤何等深重，但他在书末的《总结论》中仍在努力发现“相信未来”的理由：如“不可摧毁的”民族统一，一个“可以认为最终稳定下来”的政府。尤其是进步的历程将重新开始，“各民族将再次启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有理由期望和相信，法国仍将是先锋”。^②

但是，到20世纪末，对未来的这三种期待都已经幻灭。^③ 不仅回归传统已无可能，革命意识形态也已衰落，进步主义则随着经济危机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爆发而受到普遍质疑。左翼人士、共和国总统密特朗也公开承认，“对进步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狂热不完全符合我的意图……我们不再生活在启蒙时代……我们认识到理性女神的两面性。”^④ 未来并没有消失，但它已不再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过去的乐观和进步如今让位于责任和谨慎。^⑤ 就法兰西民族而言，它已不再是引领世界的舵手，《记忆之场》追忆过去也并非为了展望法兰西民族的远大前程：“将未来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民族神话已瓦解”，“过去不再是对未来的保证”。^⑥

未来主义视角下的民族史不仅憧憬光辉的未来和无限的进步，还着力塑造过去与当下的连续性，“因为我们通过过去来景仰的正是我们自己”，^⑦ 拉维斯正是负责在学校中教育孩子们树立这样的信念：“我们的祖先，就是过去的我们”。^⑧ 在19世纪，寻找各种起源，塑造当下与过去的延续性成了一项使命。对于复辟王朝一代的史学家，学术和政治上的一大基本任务是弥合大革命与民族历史的割裂。他们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研究证明，大革命“是10个或11个世纪的历史戏剧的自然结局”，1789年的断裂“被纳入许多世纪的漫长的连续性序列中”，“一种有关历史时间的深度和力量的新意识确立了起来”。^⑨ 人们把大革命起源和第三等级兴起追溯到12世纪的公社运动。这种“长时段”的历史意识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梯叶里《法国历史通信》的发表是“民族的长时段历史的酝酿时刻”。^⑩

相应地，在拉维斯的《法国史》中，民族历史的重心是在历史的上游，研究1453年之后历史的学者被歧视是理所当然的，“现代民族史的大部分奠基人都是从研究中世纪史起步的”，这种现象根源于一种认识论，即因果关系可将最新和最古老的事物串联起来，而档案文献则为此提供了“科学主义”的加持和“象征资本”。全书采用近乎一致的叙述手法，“官方文献的叙述方式与暗含的国家连续性思想的自然融合造就了这部著作的统一性。”^⑪ 因此，拉维斯的民族史

① Gabriel Monod, "Introduction. Du progrès des études historiques en France depuis le XV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vol. 1, 1876, p. 38.

② Ernest Lavis, *Histoire de France contemporaine, depuis la Révolution jusqu' à la paix de 1919*, Tome 9, Paris: Hachette, 1922, pp. 511, 515, 551.

③ Pierre Nora, "Comment écrire l' histoire de France ?" p. 2232.

④ Patrick Garcia, *Le Bi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ratiques sociales d' une commémoration*, p. 72.

⑤ François Hartog, *Régimes d' historicité: 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 p. 261.

⑥ Pierre Nora, "L' ère de la commémoration," p. 4712.

⑦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 p. 35.

⑧ Philippe Joutard, *Histoire et mémoires, conflit et alliance*, p. 110.

⑨ Marcel Gauchet, "Les 'Lettres sur l' histoire de France' d' Augustin Thierry," pp. 787-850.

⑩ Marcel Gauchet, "Les 'Lettres sur l' histoire de France' d' Augustin Thierry," pp. 806, 822.

⑪ Pierre Nora, "L' 'Histoire de France' de Lavis, pietas erga patriam," pp. 869-881.

是在统一的框架中以编年体的方式塑造有目的的连续性。^①正是因为这种目的论和连续性的编年体例，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才得以通过一条强有力的线索串联起来，它们被赋予意义，并与未来建立起关联。

例如，梯叶里曾论证说，法国的“自然疆界”是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民族理想，具有“深刻的民族性、深刻的历史性”。^②在拉维斯那里，查理七世在法国尚未恢复元气时就已经在追想，莱茵河左岸“从前属于法国的先王们”。^③这是要在遥远的过去与当下的诉求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为尚待实现和巩固的民族目标寻找“历史依据”。因而历史必须是连续的，过去应该为当下提供论据并保障未来的权益。

然而，当民族成为“遗产”，边界已淡出人们脑海时，这种连续性的历史论据就显得不必要了。相反，《记忆之场》打断了拉维斯主义塑造的历史延续性。查理七世时期的法国更加认同的是“四河之境”而非莱茵河自然疆界，后者是被发明和操控的民族记忆。同样，既然共和国也已是事实，国庆节的战斗日意义便退化为消费活动了，旺代人也可公开回忆共和国当年的暴行、否认拉维斯主义的神话。拉维斯说，大革命期间，各省人民“忘却了、抹去了各种地理的、历史的差异”，“以自愿行动创建一个现代民族”，^④但这是以掩盖旺代等异质记忆为代价来塑造民族历史的统一性。国庆日、边界等民族象征符号便与当初被拉维斯主义赋予的历史意义脱钩，法国人关于民族过去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过去的意义曾寓于民族的象征体系中，但现在，7月14日、《马赛曲》曾传达的认知和情感已经淡出了日常生活，人们甚至不记得环法大赛和埃菲尔铁塔当初的政治用意：往日记忆已经与当下割裂，“过去对我们而言是个截然不同的他者，是一个已与我们永远割断联系的世界。”^⑤法国人已经走出民族主义历史中“人为制造的永恒性”，当他同时面临一个与进步主义颇为不同的“不可预知的未来”^⑥时，他思考和关注的出发点就转移到了当下：“未来无限开放但无法预知，对过去的解释众说纷纭，但最终让人看不清，当下已然成为我们自我理解的范畴。但这是一个已然膨胀的当下，其中的变化持续不断。”^⑦

无需唤起记忆之场最初颇具战斗性的民族主义，也不必去展望民族的光辉未来，一句话，活在当下：曾经体现在这些象征之中的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在当下的活动中消退了。当下同样是《记忆之场》的立足点，因为它意识到，“过去与未来的结合被当下与记忆的结合取代”。^⑧就像2002年诺拉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提到的，在这种局面下，应当尝试一种新的法国历史，以便让公民感受到法兰西的存在。^⑨它不必以未来统摄过去并赋予其意义，也不必以过去来论证当下：所有关于破碎的过去的记忆都是复数的或“广义的”法兰西的组成部分，不需要像拉维斯主义那样压抑和排斥他者。这就是诺拉的当下主义民族史的基本特征。

①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mode d’emploi,” p. 161.

② Augustin Thierry, *Ré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 Précédés de 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2^e édition, Paris: Just Tossier, 1842, pp. 192-194.

③ Ernest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contemporaine, depuis la Révolution jusqu’ à la paix de 1919*, p. 512.

④ Ernest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contemporaine, depuis la Révolution jusqu’ à la paix de 1919*, p. 511.

⑤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 p. 35.

⑥ Pierre Nora, “La nation-mémoire,” p. 2215.

⑦ Pierre Nora,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p. 2232.

⑧ Pierre Nora, “L’ère de la commémoration,” p. 4712.

⑨ Richard C. Holbrook, “Pierre Nora (1931-),” in Philip Daileader and Philip Whalen, eds., *New Historic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French Historians, 1900-2000*, Oxford: Wiley-Blackwell, pp. 444-445.

当下主义还意味着历史学家地位的转变。在第三共和国，历史学家既是科学家也是战士，他们负责以过去论证当下并展望未来，他是时间中的摆渡人。^①但是，如果当下不再是过去通往未来的桥梁，历史学家的角色便与第三共和国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他不再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二传手，不是摩诺式的教长或米什莱式的先知。^②

结 语

《记忆之场》是法国这个曾经的经典民族国家走向衰落后，它的历史学家试图从过去对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中、从往日曾引发各种冲突的主题中寻找自身的努力。诺拉比拉维斯更具包容性，因为曾被民族史学排斥或掩盖的记忆，也被他视为民族遗产的一部分。不过，这些记忆元素之所以能展露头角，是因为拉维斯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民族和共和国都已不再需要历史学家去论证和捍卫。从这个意义上说，拉维斯的《法国史》和诺拉的《记忆之场》见证了两种不同的民族历史，民族本身的演变使得拉维斯式的民族史不可能继续，它的新处境要求对其过去进行新的表述。

在谈到记忆之场的概念是否可以输出时，诺拉再次强调了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的深刻变化的独特性，以及法国史学传统与其他国家的差别。^③《记忆之场》涉及内容可能是法国独有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带有普遍性。如对少数群体和边缘性价值的肯定。当被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压抑的记忆开始自我表达时，前者就面临被淡化乃至走向破裂的可能，这是一种普遍性的挑战。再者，革命意识形态及其“期待视域”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衰落，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进步主义和革命史叙事及其暗含的历史连续性的信念。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新状况，能否在克服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狭隘性的同时，在更具包容性的基础上重新表述民族的过去，这是《记忆之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迪。

就历史学科的内部效应而言，诺拉倡导的第二层次的历史和史学史转向，不啻为对传统民族主义史学的一次解构。因此《记忆之场》是一种批判性的历史研究。然而，批判性的历史研究与历史记忆是有张力的。记忆具有神圣性，而历史学的真正使命是去神圣化，^④由此引发的危机同样具有普遍性。《犹太历史与犹太记忆》的作者就面临这样的危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是围绕记忆构建起来的，但现代历史研究对真相的追求使得传统的记忆逐渐失去了神圣性。^⑤如果说传统的民族历史意在塑造一种政治认同，那么“信”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即历史应转化为国民的集体记忆；但如果历史学自命为科学，那么“疑”就是它的本质属性。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的民族史从源头上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作者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焦 兵 窦兆锐）

① Pierre Nora,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 p. 2231.

② François Hartog, “Temps et histoire: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 p. 1232.

③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sont-ils exportable ?” pp. 373-384.

④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 pp. 24-25.

⑤ Yosef H. Yerushalmi, *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 这位作者说，他从事这项研究时，并不知道诺拉也在关注集体记忆问题，直到1984年12月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才得知自己并非孤独的研究者。见前揭书页 xxix。

seem more like a “trap” dug by Thucydid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we should approach it with prudence rather than accepting it uncritically.

Exploring Thucydides’ View of the Causes of Peloponnesian War He Yuanguo (126)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we only have Thucydides’ version of the causes of Peloponnesian War. It is generally held that the view in Book I 23. 6 (“The growth of the power of Athens, and the alarm which this inspired in Lacedaemon, made war inevitable.”) represents Thucydides’ main judgment. Although this judgment is the product of deep thought, it is not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Even if one interprets the text as saying the war was “inevitable,” this is just one party’ s subjective judgment rather than an objective law. Thucydides simply emphasized what he thought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Book Review

“Realms of Memory” and Pierre Nora’ s Writing of French National History

Huang Yanhong (140)

After World War II, the orientation toward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s new history weakened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history narrative. A series of major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French society of the 1970s reduced consciousness of the nation-state, and individualized historical memory and counter-memories and identities beca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s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Lavissian nation-state fragmented. It was in this context that “les lieux de mémoire” emerged; Nora seeks to pursue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ithout nationalism by recalling the realms of memory. Although inspired by Lavissee’ s *L’ histoire de France*, this study, more inclusive than Lavissee’ s, is a reflective “second-order history” that attempts to seek identity in the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memory following the decay of nationalist ideology. The proposed lieux de mémoire implies a profound change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lationships of French national history, a change that undermines historical continuity. This can be regarded as a new marker for a historical system: “presentism.”

Historical Not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der of Chapters of the *Lao Zi* Liao Mingchun and Li Cheng (158)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urport of the Han Bamboo Slips Text *Cang Jie Pian*: *Kuo Cuo* in the Peking University Collection Yang Zhenhong and Shan Yinfei (167)

Uncovering the Truth of “Borrowing Soldiers from Siam” in the Imjin War during the Ming Wanli Reign Period Zhou Ying (178)
